采风论坛 10

CAIFENG LUNTAN

陆勇昌　潘朝霖　主　编

主办　黔南州文学艺术研究所
贵州民族学院水书文化研究院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采风论坛
CAIFENG LUNTAN

0756420

采风论坛 10

CAIFENG LUNTAN

主办 黔南州文学艺术研究所
贵州民族学院水书文化研究院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风论坛/ 陆勇昌，潘朝霖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06-875-9

Ⅰ.采… Ⅱ.①陆…②潘… Ⅲ.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贵州省—文集 Ⅳ.K28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998 号

采风论坛

主　　编：陆勇昌　潘朝霖

责任编辑：刘　彬　　版式设计：逗　号

责任校对：姜　燕　艾利娟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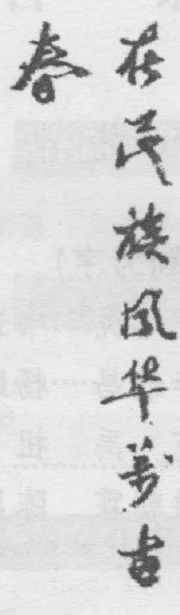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875-9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87年3月，中国民俗学会原会长钟敬文先生在首届中国民俗协会(贵阳)上欣然提笔，书赠采风杂志。1991年采风杂志转为采风论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编委会

主　任：李　芸　韦宗林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朝北　王思民　韦述启　卢延庆
刘世彬　李继昌　杨路塔　杨殿斛
陆勇昌　范　禹　祖　明　蒙爱军
潘仁英　潘朝霖　陈显勋

目 录

前沿话题

行走于田野与文本的双重世界 …… 潘年英 王 倩(1)

艺术探索

故事创作与现代生活 …… 徐华龙(17)
当代影视中的古代民间传说
——以《白蛇传》为例 …… 李 云 李 扬(28)

水族文化研究

中国水书研究未来趋势分析 …… 韦学纯(38)
东巴文、水书、彝文试比较 …… 王炳江(59)

田野观察

黎平地扪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考察 …… 杨正文(75)
台江姊妹节手记 …… 卢延庆(90)
后山人类学田野札记 …… 潘璐璐(99)
黔南布依族丧葬礼仪习俗
——以荔波县驾欧乡拉欧一带为例 …… 陈显勋(108)
水族九阡酒酿制工艺的调查研究 …… 罗开梅(112)

文化与文学研究

佛教、道教在贵州的传播 …… 周国茂(122)

城市景观建设中构建桥梁景观群的美学思考 …… 祖　明(135)
南方喀斯特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建设初探
——以贵州省荔波县生态文化建设为个案 …… 覃敬念(143)
贵州毛南族的猴鼓舞与傩文化 …… 樊　敏(154)
正在成长中的人类学"骄子"
——综述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 吴汉男(159)

历史中的文化透视

清中叶贵州基层土司政治之挑战
——以烂土长官司张氏为例 …… 陈贤波(168)
《中华吴氏延陵迁黔宗谱》赏读 …… 刘世彬(187)

民俗思考

法律判决的风俗 …… 杨戴云(194)

地域文化

化州跳棚的傩文化意蕴 …… 叶春生(205)
黔南州文学艺术研究所46年工作回眸 …… 杨路塔　王思民(210)
"六月六"独山布依族的母亲节 …… 黎以忠(224)
浅议瑶族的禁忌文化
——以白裤瑶女性为例 …… 张红娜(228)

民族教育

以文化特色打造民族地区图书馆新形象 …… 陈剑虹　陆晓丛(233)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水族双语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双语教育现状为例
…… 陈　晨(237)

前言话题

行走于田野与文本的双重世界

——潘年英访谈录

访谈人：
潘年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王倩，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6级文学人类学博士生
访谈时间：2007年11月4日
访谈地点：四川大学留学生公寓

王倩：近期的许多学者与文学批评者，在您身上贴上了不少标签，有人说您是一位行走在文学世界的人类学家，有人说您是行走在田野中的作家，还有人说您是一位将人类学做成文学的外行教授，甚至有人说您是一位矫情的侗族歌手，在田间唱着早已失去灵魂的歌谣。作为被批评的对象，您接受这些满天飞的标签与称号么？

潘年英：我不存在接不接受的问题，任何批评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王倩：就是你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您？

潘年英：别人怎么命名是人家的事情，那是他的自由。我自己的写作，就是为这个民族而写作，为自己的心灵而写作，为生活而写作。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一种生活，都是我对生活的理解。我没有把人类学的文学或者文学的人类学这种东西分得很清楚，我不太习惯把它做一种富有理性的辨析，我就是觉得人类学对我是有帮助的。昨天还有几个学生在我的房间里面聊天，我还跟他们讲了这个事。就是说，人类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方法，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还有就是一个思想。作为方法，也是它最有力、最好的一点，就是客位思考问题

的一种方法，它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一点特别好，以前我们每个人到一种异文化的地方去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去看别人的文化，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有人回来之后就会说，那个地方的卫生怎么样，厕所怎么样等等，做这样的一种价值评判。这其实是不对的。人类学首先要改变你的这种观念，告诉您不要盲目地简单地去做评价。

王倩：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是么？

潘年英：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的一个传统的理论。

王倩：这是一种视角，它不是一种方法。

潘年英：它也是一种方法，它教你怎么去观察这个世界，因为以前先入为主了，你脑子里就有一种东西了。如果带着一种成见去判断一种东西，它可能就是歪曲的。可是您却没有想到人家怎么看待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会有这种文化现象？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有了人类学这种客位的思考角度，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就不一样了。人类学在西方是一种基础学科，许多大学里面都开有这门课程，人类学首先教给你一种观念，对异文化上的平等观念。有了这些东西，我们自己的写作、思考就会受益匪浅。至于我自己的文本有多少人类学的含量，有多少文学的价值，这个我不去思考。我思考问题很简单，我的作品首先必有真实的力量。

王倩：文学乃是真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潘年英：文学作品的情节可以虚构，但它所有的虚构、所有的想像，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作家王安忆就主张写作要“回到常识”。你看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常常给我们一种很假的感觉，令人很难接受。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它根本不是常识，它是脱离了常识，生活中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他是臆想出来的。那么我的东西首先必须得真实。

王倩：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只不过人类学观察对象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田野的考察，另外一种是对文本的考查，法国人类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勒内·基拉尔甚至主张取消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转而对人类社会的书写文本做一种“祛魅”考察，发现文本背后被暴力所遮蔽的真相。你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通过田野考察，将原生态的田野放入自己的文本之中，没有经过任何遮蔽，不过我感觉其中并没有基拉尔所

强调的暴力痕迹。您没有遮蔽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一草一木，哪怕是一片树叶，你都力求还原其本相。我可以在您的作品明显看出。这种真实其实是现有世界的在您作品中的一种折射，用您的照片或者文字来叙述。你说你是采取客位的方式来思考文学人类学，或者可以说，是用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对真实世界做一种表述。尽管你口头上老是说自己对人类学是外行，或者是不沾边的一个人，其实你做的一些比任何人都要内行。那么，在您一系列作品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这种客位的思考方式是先天存在于你的思考之中呢，还是后天接受人类学培训所造成的？

潘年英：应该说我的这种意识主要来源于我的生活经验，但在接受了人类学知识熏陶之后又不断被强化了。《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刘大先曾经为我写过一篇文章，他从文学意义的角度对我的作品做了一种解读。文学的这种没有遮蔽的真实性其实是自我历史的一种书写。我的作品中有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有人就会认为这是写我自己的亲人，我的自传等等。我不否认我对作品做了必要的文学修饰或虚构，但是呈现出的那个文本给读者的感觉却是真实的，不是那种虚幻的世界。其实作品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不一定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有太多的联系。文学本身来自于真实的生活，这是我创作的原则。实际上我对文学还是比较有造诣的，我读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现代的东西我也看了不少，我有相当的文学积累。但是我的文学世界是一个经过了选择、扬弃和过滤了的世界，实际上我是用一个很现代的方式来书写我的乡土世界，叙述我的家乡。在某种意义上我有点像汪曾祺，绕一个圈子以后又回到了起点，汪曾祺年轻的时候学西方的现代派，但是后来他回到传统与乡土的世界中，他转了一个大弯。实际上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但我还没有绕一个弯就开始回去了。我现在可以写像余华的《活着》那样的东西，也可以像马原那样比较注重形式的东西，或者还可以像莫言那样写一点魔幻的东西，这些对我来讲都没问题，我觉得我都可以写，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写。为什么不去写？因为我觉得它跟我感受的现实是有距离的，我现在需要一针见血、需要直指生活的本质。我看到的生活现象、生活的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非常优美、非常漂亮的文学叙事，不需要做任何虚构。所以我的很多作品都可以找到原型，那些人有的现在还健在，我还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常与他们保持联系。

王倩:您早期的一些创作并非纯粹是人类学风格的,有一些是对沉重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述。你一直在强调真实,除了这种真实以外还有善与美,这些在您的作品中都有所呈现。但是这些生活的真实描述已经带上了文学的过滤。那么在表述你乡土世界真实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刻意遮蔽一些东西?具体来说就是,您是否在文本中刻意回避了生活中恶的一面?

潘年英: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沈从文看到的乡村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破败的世界,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就讲到,他看到的乡村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乡村世界,是一个非常恶的农村,但《边城》描述的湘西却美得让人禁不住要掉眼泪。我不否认,我的作品中有时候有对现实世界恶的方面的刻意回避,就像沈从文那样。但也有不遮蔽的时候。比如我写城市生活题材的那些东西,许多时候实际上就是对生活的如实描述而已。我有一个观念,我认为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大于任何作家的想象。在生活面前,作家的虚构实际上是很苍白无力的。所以我的创作许多时候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写。当然如实描写也需要能力,并不是说如实描写是很简单的文学形式。我还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记忆,是对生活的一种追忆。我们大家一般讲文学是一种想像,想像是肯定的,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我要强调,文学更主要的还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就必然带有作家个人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改写和过滤,但改写和过滤也还是真实的,甚至更加真实,因为主观的东西往往是经过了综合分析的结果,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东西。我的作品总的来说就是对往事的追念,同时有忧伤、愤怒和颓废。

王倩:你的文本其实是对真实田野的诗性书写,可以这样说吗?

潘年英:对。为什么说它是诗性的,就是因为这里面包括我对生活的记忆,同时也是一种呼唤,不是说这东西完全没有想像,它有想像。比如说,有一个老师看到我的作品后,觉得我的家乡太美了,一定要去我的家乡看一看。后来他们去了我的家乡,看到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破败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美丽。我的文本世界里有一条河,河水非常清澈,里面有鱼,小孩在岸边晒太阳,用石头一砸,就可以将鱼砸死。他说这个东西太美,一定要跑到我的家乡去看看,结果

去了，回来告诉我说，那是一个臭水沟，哪有什么河水，更找不到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我说这条河流是我过去生活的一个记忆，它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在短短的二十年发生了变化，我的家乡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森林没有了，溪水也干涸了。当时我们那个村子一共才有四十多户人家，现在已有八十多户人家，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增加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我记忆中的河流与森林自然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你要从现实中寻找生活的记忆，你如果没有我同样的生活经历或见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有些人能够看到，他能够在里面看到那些残留，记忆里残余的东西，包括延续下来的那种文化精神。那些人，你看他们已经不穿民族服饰了，心理同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自己本土的东西不是那么在意了，这就是我忧虑的东西。我为什么忧虑？因为这些原有的东西已经面目全非，甚至千疮百孔，我感到很心痛，希望保留它们。

王倩：我明白，您是想保护一种自给自足的原生态文明，不想让现代工业文明毁坏现有的文化自足性，可是拥有这些文化形态的人们却不是那么自觉，他们已经沾染了太多现代工业文明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不愿意回到原初的自足性上去，是吗？

潘年英：对。传统社会里的人们，生活方式是慢节奏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难得看到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今年种稻子，明年种稻子，后年还种稻子，每天的生活就这样重复着、延续着，而人们获得的是一种自给自足、自我满足的生活。当地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种文化形态，我叫它原始文明，上次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语来表述。

王倩：现在不提倡用原始文明。

潘年英：现在都叫原生态文明了。

王倩：这个好听点。

潘年英：使用什么样的概念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看到了当今迅速变化的事实。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或者典籍将这一种文明形态叫做野蛮人的文化，到资本主义以后才叫文明。实际上我的看法刚好相反。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这种文明开始被破坏，开始衰退。而且衰退得非常厉害。由于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和同质化，这种文明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于是全世界的土著都向现代文明看齐，因为他

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要赋予土著一种觉醒，一种自觉，如果土著不自觉，它就认为新鲜就是最好的，乃至于像塑料、眼镜这种现代文明的病态产品他也觉得很好。其实不然。我们戴眼镜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东西，那个山里人他要眼镜干什么？他的眼睛好得要死，几千米以外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清楚！还有你看农村里大量的塑料制品都正在取代传统的木制品，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木制品比那个塑料制品值钱，环保。现代文明这种病态的东西他没有经过分析，他也没有这个分析能力，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好，所以现在你到农村看一看，整个地被现代工业文明的垃圾填满了，传统的农业文明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王倩：前几天在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同时在休息做交流的时候，你都反复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你的父亲是一个巫师，能用一个绳子做套，念几句咒语，就可以逮住许多山里的小动物。这个里面包含着巫术。我们理解的巫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非理性思维的表现，与所谓的科学是对立的，因为科学是理性思维。刚才你也说过了，说现代工业文明对原生态民间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破坏。您的一系列作品都隐隐约约有一种东西，它不属于一般的现代工业文明，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乡村的东西在其中跳跃。我觉你看着的不是现代工业文明，不是往前看而是往后看，你走着一条往回去的路，你要回到哪里？

潘年英：我回到后现代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王倩：就是你说的原生态文明。

潘年英：不是原生态，就叫生态。原生态是指过去，生态却只限于未来。就是说，我其实不是在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未来。

王倩：人与环境的和谐，万物相互感通。

潘年英：对，我现在呼唤的就是一种自觉的生态文明。而这种文明并非空想，而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根基。

王倩：所以你要保卫传统。

潘年英：是保卫传统。所谓的保卫，就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思考之后的一种保卫，不是将所有的东西都完全继承下来，而是有选择地保护。我为会议提交的文章里有一个提法没有展开，我讲到原生态保护不可能，原生态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保护。因为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当

地人他会不同意我们原生态保护，他会质疑你，说你们凭什么要我们来保留传统，而让你们去享受到现代文明的福利？让我们保护传统，让你们来参观，把我们变成动物，变成猴子，这根本不合理。他不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没有道理让他们来保卫传统。我们要保卫传统，就是要保卫传统中的和谐的东西，就是要把那种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传统继承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自觉。我觉得，文化自觉首先是土著要自觉，要让他们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到底哪些是好的东西，哪些是不好的东西，要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比如说我们搞了大量的生态博物馆，搞它干什么呢，其实我们搞它，多半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的，就是做一个像保护区一样的东西。

王倩：把它圈起来。

潘年英：对，就是把他们圈起来，做这项工程的人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但当地人他不管你，他们不干，不愿意当猴子被人观看。最早到中国来建生态博物馆的那个叫吉斯特龙的挪威人，在跟当地人做交流后，他最后还是向当地土著妥协了。为什么妥协呢？他没有办法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凭什么来参观我们，而我们不能去参观你们，这是个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促使他自省的问题。

王倩：当地原著民处于一个被观察的他者地位，他们觉得，用你的现代化的文明来可怜我，把我看成文明边缘的一个他者，我不干。你们当地的老百姓反抗了没有？在你搞保卫传统的那个地方，他们拒绝参观吗？

潘年英：当然，他们很希望人家去参观，但他们其实是希望人家去他们那里消费，使他们早日脱贫致富。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生活的压力才妥协的，如果没有这种经济上的压力，他们哪里希望人家去参观他们！吉斯特龙后来采取了一种办法，就把当地的几个土著代表拉到欧洲去看了一下，他们回来后还是有很多体会的，就觉得他们看到的欧洲生态博物馆，跟我们的还是不一样，起点不一样，简单地说，欧洲生态博物馆，实际上是欧洲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省，而我们的生态博物馆则是一种脱贫致富的手段。

王倩：它是内在的。

潘年英：对，它纯粹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就像我们成都郊区搞那些古镇一样，那就是成都人在文化上的一种自觉，就是说成都人需

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了，于是重新建立起来。这些古镇搞得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情，但起码说明成都人搞这些东西是在吃饱穿暖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个出发点，就跟贵州省搞的那些生态博物馆完全不一样，贵州的出发点是脱贫，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欧洲人做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保护所有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将早期的工业矿区都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整体保留下来。他们需要这样一种记忆，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历史。他们认为以前曾经在这里生活，有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值得保留下来，于是就做成了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即生态博物馆，他们是整体地保护下来的，那些矿区的人还继续呆在那里，因为他们有新的生活来源了，已经不存在温饱问题了，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了嘛，因此他们很高兴被参观。但我们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些被参观、观看的人们还没有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所以他们年轻人现在都基本上出去打工，打工回来他就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出去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那个世界里的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自豪感，他们生活优越，居高临下，所以，那些土著的打工仔就认为那是他们的榜样，他们也渴望有朝一日能做那样的人。几乎所有从城里打工回来的人的身上都会沾染上流行的城市文化的气息，他们带着质朴的气质走向城市，而带着一身的现代文明回到故乡。政府为他们的外出搭桥铺路，经济学家也为此高唱赞歌，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些人的大量外出打工，实际上却在加速一种文明的摧毁，最终导致整个传统文化形态的彻底崩溃。但是，不让这些人外出打工行不行呢？不行。不去打工，他们就没有收入，经济上会更加拮据，生活会更加困难。所以，这里边有个很大的矛盾，吉斯特龙是没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妥协。开始建生态博物馆的时候，他不准收门票，他说你这个东西是整体保护的，你怎么能收门票呢？那不成了旅游开发了？但后来他发现，不收门票那个生态博物馆就没办法搞下去，因为那个博物馆还是要人来管理的，但不收门票他就养不活那些搞管理的人，所以最后他妥协了，同意收门票了，他只是要求尽量便宜一点而已。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后来他也没法干预。情况完全不像他预想和设计的那么发展。现在的所谓生态博物馆建设，实际上完全等同于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的地方，现在也都无一例外

地都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国家没有专门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经费，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当然这跟我们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说起来我觉得很丢脸，我们的四个生态博物馆都是由挪威人来支持修建的。

王倩：政府拿不出钱来？

潘年英：我们国家怎么会拿不出来钱呢？绝对拿得出来！

王倩：这就是理念有问题。

潘年英：理念有问题。叫一个小小国家来资助修建生态博物馆，还跟人家挪威的国王签订了协议。国家主席出席签约仪式，表面上看起来是重视，其实就是想占人家一点便宜而已，所谓“引进外资”。

王倩：这是你们老家的博物馆？

潘年英：我讲这个生态博物馆，主要是在贵州。堂堂一个大国，自己不建设自己的生态博物馆，叫一个欧洲小国来资助我们，这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政府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想不想保护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思想前提下，即便我们暂时地得到了人家的一点资助，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还有一种学者的观点更荒唐，他们认为，对那些地方的文化，根本就不要去保护，他们说，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去管它。

王倩：让它自生自灭。

潘年英：对。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就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对待这种原生态文化，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不发展，所谓“原生态保护”。我跟他们讲，你不管它，行吗？不行。不管它，它马上就彻底消亡了。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太多了。我最近在做一个课题研究，就是研究一个刚刚消亡了的苗族文化标本，它就在贵州省的三穗县，叫寨头苗寨，二十年前，它和雷山的西江一样，是一个很著名的苗寨，规模也很大，跟雷山西江不相上下，都是上千户的苗寨，原来从建筑到服饰到语言，都保持着非常浓厚的苗族文化特点，但现在它的这些特点都已经基本消亡了，从外表上看，你已经看不出它是一个苗寨。这就是让它自生自灭的结果。也是所谓不保护就是最好的保护的最好例证。

王倩：外来的东西压得太紧了。

潘年英：当然从理论上讲，不保护的确也是一种保护的措施和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